

日本经济“双循环”发展:演进历程、经验教训 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田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7)

摘要:如何有效平衡经济内外循环的关系,始终贯穿于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在外循环方面,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日本积极推动出口贸易与经济国际化,完成工业化后则着力实施产业链海外布局与对外经济战略;在内循环方面,日本推动经济秩序的重建及产业升级转型,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结构性问题愈发突出。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时,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单循环”的误区,国内国际循环无法形成有效衔接,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日本经济双循环体系的发展历程,对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日本经济;内循环;外循环;产业升级;国内需求

中图分类号:F124;F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22)06-0075-10

DOI:10.16436/j.cnki.52-5023/d.2022.06.013

在2020年4月10日的中央财经委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的比较优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1]。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其贸易依存度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维持在20%左右,而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下降至15%左右。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开始持续上升,到目前为30%左右^[2]。观察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内循环和外循环关系的处理,对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当前,学界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分析日本经济双循环体系构建启示意义的相关文章还不多见,目前主要有张乃丽等分析了二战后日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指出其对中国的参考意义^[3];谢世清等分析了日本在内循环与外循环构建方面的特征性举措^[4];等等。

本文基于日本经济发展情况,从分析日本外循环、内循环的主要政策措施入手,探析日本处理内循环和外循环间的关系,阐明不同处理方式所带来的不同经济绩效,并指出只有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才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日本经济“双循环”发展的演进历程

(一) 日本经济的外循环

对日本经济而言,外循环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实现工业化前,日本实施鼓励出口政策,加速出口贸易发展,但引发日美贸易摩擦问题,阻碍了日本经济发展。在实现工业化后,日本积极开展产业链国际化布局,并构建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将对外贸易作为驱动日本经济发展的引擎。

收稿日期:2022-09-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战后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的历史、理论与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1BGJ05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田正,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日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日本产业、日本经济政策。

1. 出口贸易的发展与经济国际化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低廉,国际市场需求旺盛,这对日本加工贸易发展十分有利。以中山伊知郎为代表的日本经济学家提出“贸易立国”主张,认为基于日本的国情,为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必须加大对外贸易的发展力度,而加工贸易则是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受此影响,“贸易立国”被确定为战后日本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

在“贸易立国”战略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一方面,提出多项出口振兴措施。依据《出口信用保险法》建立《出口保险制度》,为企业的出口产品提供担保服务,降低出口企业风险。制定《出口检查法》,完善出口产品质量检查制度,提升出口货物质量。建立出口优惠金融制度,日本银行对出口汇票予以再贴现和贷款担保,降低出口企业出口贷款成本。实施出口振兴税收制度,对购置先进机械设备、推进出口商品生产的日本企业,给予生产设备的特别折旧税收优惠^[5]。另一方面,设定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日本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日元汇率被低估,从而为促进日本商品出口提供了有利的交易条件。

虽然日本在1955年就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但并未立即实施贸易与资本自由化,而是竭力抑制外国工业产品进口,阻滞外国资本进入日本,以图扩大对外出口。为促使日本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循环,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政府致力于推动日本经济的国际化,提升贸易与资本的自由化水平,但是在策略上却刻意放缓贸易和资本自由化进程,以提升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日本政府在1960年通过《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而后分别在1963年和1964年接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一条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承诺不对进口实施有差别的限制,贸易自由化比率从1960年的41%稳步上升至1964年的93%,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完成不具备竞争力的“剩余受限品目”贸易自由化。例如,对于小型汽车的进口关税,在1968年时仍高达40%,直至1974年日本汽车产业具备充分的竞争力后才降至6.8%。在资本自由化方面,1964年日本决定加入经合组织,因此必须履行资本自由化的义务,但日本政府仍然实施拖延策略,为外国资本在日本国内设厂设置比例限制,即外资在新设工厂中的资本占比最高只能达到50%,防止外国公司取得控制权,直到1973年日本才最终放开对资本自由化的限制^[6]。

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日本最终实现了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一方面,日本的对外贸易额迅速提升。日本出口贸易额从1973年的15.9万亿日元增加到1985年的41.5万亿日元,贸易顺差也从0.4万亿日元提高到12.9万亿日元^[2]。另一方面,从贸易结构上看,日本实现了从以轻工业品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换。1950年,食品、纤维等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率高达54.9%,机械产品占比仅10%。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重化学工业化的发展,日本的钢铁、船舶、化学、汽车等产品出口迅速增加。到1980年时,一般机械、电子机械、汽车等资本密集型机械产品的比重已经提升到62.8%,远高于轻工产品的6.1%^[7]。

随着日本经济外循环的快速发展,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持续增长,还引发了激烈的日美贸易摩擦问题。1985年,日本对美国出口额达666.8亿美元,而美国对日本的出口仅为226.3亿美元,美国对日逆差达440.5亿美元^[8]。受此影响,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从纤维与钢铁扩展至汽车,进而拓展至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1986年,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半导体协议》,美国限制从日本进口半导体产品,并对日本市场中美国半导体产品占有率设置“数值目标”,以增加美国产品占有份额^[9]。

2. 产业链的海外布局与对外经济战略的开展

自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挑战,日本经济开始进一步走向全球化。“雁行经济发展理论”成为日本实施外循环战略的指南。赤松要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产业发展呈现出“雁形”特点,需要经过进口消费品、生产相似产品、实现逆向出口三个阶段。这不仅表现在一国之内,还体现在国家(地区)之间,即日本追随美国,亚洲四小龙追随日本,而东南亚国家又追随亚洲四小龙。例如,当日本某一产业发展成熟时,其产业国际竞争力变弱,而后亚洲四小龙承接日本的技术实现产业发展,而日本的产业结构则升级到新的层次。小岛清将雁行经济发展理论进一步模型化,并运用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分析日本国际化发展,指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按本国陷入比较劣势的行业顺序实施^[10]。

日本基于雁形经济发展理论将自身定位为“领头雁”,致力于发展一般机械、电子机械、汽车等加工组装行业,而将失去比较优势的纺织、钢铁、化学、造船等加工转移至亚洲四小龙及东盟,试图构筑以日本为核心、亚洲各国(地区)为侧翼紧随其后的多层追赶的产业链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快速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加速产业链的海外转移,日本对亚洲四小龙及东盟的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迅速增加。从1980年至1990年,日本对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的直接投资从3.8亿美元、7.8亿美元增加到33.5亿美元、32.4亿美元^[11],出口额从189.1亿美元、91.6亿美元增加到557.4亿美元、222.4亿美元。日本还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1974年设立“国际协力事业团”专门开展政府开发援助工作,1980年日本对亚洲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数量占其总额的比重达到61.7%^[12]。

20世纪90年代,日本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乌拉圭回合谈判。在1995年WTO成立后,日本积极在WTO中任职,有效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拓展外需市场,谋求自身利益。自21世纪以来,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日本政府调整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消极态度,对双边以及多层次的国际贸易体制机制构建表现出积极态度。日本政府认为,推进FTA战略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对既有的多边贸易机制具有补充作用,能够推动日本经济发展^[13]。2004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今后推进EPA的基本方针》,将缔结广泛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作为战略目标。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分别与新加坡、墨西哥、智利、东盟、印度、秘鲁、澳大利亚、蒙古等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FTA)^[14]。2013年以后,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态度更趋主动。2016年《日本再兴战略》指出,日本要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核心国家,缔结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成为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引领者。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后,日本作为谈判的引领者,继续与其他十国开展谈判。2018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最终生效。此后,日本在2019年实现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和《日美贸易协定》的签署,在2020年参与完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使其自由贸易协定的覆盖范围包括了欧洲、美国、亚洲等主要经济体,日本的FTA覆盖率已经提升至80%左右^[15]。

从结果上看,日本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实施对外经贸战略,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产业链布局日益完善并不断获得收益。从2000年至2021年,日本对北美、欧洲和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金额分别从141.7亿美元、109.6亿美元、21.3亿美元增加到627.9亿美元、151.1亿美元和488.6亿美元。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收益也从2001年的1.76万亿日元增加到2020年的11.2万亿日元^[16]。

(二) 日本经济的内循环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不断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形成了以消费、企业设备投资为牵引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循环面临产业空洞化问题,且泡沫经济的产生与崩溃阻碍了日本产业的进一步升级转型,导致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

1. 经济秩序重建与产业升级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面临生产设备破坏、失业人员激增、通货膨胀严重等一系列问题,重建经济秩序成为重中之重。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对日本实施了农地改革、劳动改革、解散财阀等一系列改革,清除了日本经济体制中的封建和半封建因素,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日本执行“道奇路线”,废止“经济复兴金融公库”,遏制总需求扩大,压缩政府预算,抑制政府支出膨胀,有效控制战后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使日本获得了大量外汇,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经济发展。到1956年时,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均已达到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实现了经济秩序的重建。

在内循环建设上,以有泽广巳、都留重人为代表的日本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应该强化国内开发,实现经济自立发展。有泽广巳指出,战后初期的世界市场仍处于分裂局面,日本的立国之本在于有计划地开

发国内资源^[17]。日本立足于开发国内资源的考虑,基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大力实施产业政策,推进产业升级转型。两角良彦指出,为弥补自由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实现自由竞争体制下资源的最优配置,就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实施对幼稚产业的保护^[18]。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给出了一国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具体方法,认为符合“所得弹性标准”和“生产率增长标准”两项指标的产业,即为需要重点培养的产业^[19]。此外,日本还引入了“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方法,分析产业间技术的相互依赖关系,探究最终需求的改变对生产活动整体造成的波及效应,指导产业政策的实施^[20]。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措施,制定“合理化计划”,采取限制产品进口数量、限制外国资本流入、支持引进技术等措施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同时,建立《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和《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重点培育从事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改善生产效率,强化企业间协作,提升日本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纤维、食品的产值比重从1955年的25.9%、19.1%下降至1970年的7.9%、12.3%,而化工、钢铁、机械的产值比重则从1955年的8.2%、13.3%、4.2%上升到1970年的9.1%、14.5%、10.7%^[21]。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钢铁、化学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企业利润也随之下滑。日本实施产业调整政策,积极引导衰退产业退出市场,同时推动汽车、电子机械、一般机械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使其成为日本新的主导产业,日本再次实现了产业升级转型。汽车、电子机械、一般机械等产值比重从1960年的9.2%、10.3%、10.2%提升到1985年的10.8%、16.4%、11.1%^[22]。此外,日本还逐渐形成了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日本企业雇佣制度,减少劳资矛盾,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盈利增长带动员工收入水平提升。

2. 泡沫经济崩溃与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显现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产业链的海外转移,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问题日益突出,对日本的内循环造成负面影响。由于日本制造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向海外转移,导致日本国内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流向海外,进而使得日本国内的制造业萎缩,就业机会减少,技术发展停滞。1980年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只有3%,但是到了2001年则提高到24.6%。此后进一步上升,到2018年,已提高到36.8%。2021年,汽车、电子机械等主要产业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其海外生产比率高达41.6%、42.3%^[23]。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国内工厂设置数量从1991年的3500家迅速下降至2021年的858家^[24]。此外,产业空洞化还对日本国内雇佣人员产生负面影响。1985年,在开展海外生产的日本企业中,只有8.9%的企业表示会减少日本国内雇佣人员,而到了1993年时这一比率提升到了25.5%^[25]。另外,产业空洞化造成日本企业压缩日本国内的研究开发机构规模,使得日本的技术进步受阻。根据1994年日本民间企业研究活动调查报告,28.1%的日本企业表示其研究开发活动受到了生产基地海外转移的影响,这一比率远高于1987年的8.8%^[26]。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开始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试图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1986年日本发布的《前川报告》认为,缓解日本经济的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问题,需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住宅建设,推动国内市场开放,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27]。一方面,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城市土地开发建设。在1987年出台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进一步完善高速公路、国际机场、重点港口建设,而且提出“休闲娱乐区构想”,推动大规模休闲娱乐区开发项目建设,引发土地投资热潮^[28]。另一方面,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提振内需。1987年2月,日本银行为了避免因日元升值造成的经济衰退,将再贴现率从1986年的5%下调至2.5%,并一直持续到1989年4月。然而,大量的过剩资金并未流入实体经济之中,而是流向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导致股票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持续攀升,引发泡沫经济。日经平均股指在1985年至1989年间增长幅度超过3倍,同一时期日本三大城市圈平均地价涨幅超过1.2倍^[29]。泡沫经济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破灭,对日本经济发展造成严重

负面影响。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国内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愈发突出。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而且还会使得社会整体吸收新知识的速度下降,阻碍技术创新。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17.4%提升到2020年的28.2%,而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则从68.1%下降至2020年的59.1%^[30]。二是研发投资收益率持续下滑。虽然日本企业在研发上的投资持续增加,但由于难以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使得其研发投资收益率持续下滑,并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日本制造业的研发收益率在20世纪80年代曾为23.8%,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则下降至17.1%^[31]。三是非正式雇佣人员的扩大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下降。在企业层面,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努力削减企业经营成本,减少雇佣人员,调整终身雇佣制,推动企业的人员雇佣方式向更加灵活转变。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企业改善财务状况,却造成了日本非正式雇佣人数扩大。日本企业中非正式雇佣人数从1984年的604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2075万人。由于非正式雇佣人员占比上升,导致日本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的增加呈负面态度,居民消费意愿下降。日本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2015年的75%左右下降至2021年的65%左右,其中34岁以下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下滑最为显著^[32]。

二、日本经济“双循环”发展的经验教训

(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社会再生产存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一方面,“生产—流通—消费”体现了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实物运动,始于产品的生产而终于产品的消费,并伴随着货币流通形成社会总供给。另一方面,“生产—分配—消费”反映出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价值运动,资本家使用购买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开展剩余价值生产,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在此过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获得相应的收入,进而形成社会总需求。如果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则商品库存积压、失业增加,而如果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则会导致商品匮乏、物价上涨,居民生活水平下降。需要遵循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确保社会总供需的平衡,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33]。为此,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即一国的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同时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内需始终是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速增长时期的1960年,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和国内总资本形成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8.7%和32.8%,即便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2020年,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和国内总资本形成的占比仍然高达51.7%和24.3%^[34]。由此可见,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始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二)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当其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体系时,其经济增速显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日本在推动出口贸易发展与经济国际化等外循环的同时,也注重日本国内经济秩序的重建以及产业的升级转型,从而实现了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有机衔接,日本经济也实现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日本的GDP年均增速高达10%,其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受到世界瞩目^[34]。

下村治的“高速增长理论”给出了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处理经济内外循环关系的具体路径。一方面,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影响下,下村治认为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私人设备投资净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接近于1,因而日本经济具有10%以上的经济增长潜力,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不是供给不足,而是需求不足,需要创造有效需求,以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下村治还从外循环的角度,指出了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下村治认为日本的“进口依存度”介于8%~9%之间,而日本出口增长率远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因此出口额将持续高于进口额,贸易逆差不会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35]。下村治的“高速增长理论”为池田勇人内阁于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日本

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高速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方面推进了日本经济的建设。一方面,重视国内循环的构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设定了国民生产总值在1960年至1970年内增加2.67倍,以及国民人均收入提升2.37倍的目标。日本政府认为,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建设国内循环的重要基础,注重推动机械、钢铁、化学等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并为其分别制定了在10年内产值提升5.7、3.6、4.1倍的具体目标。日本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供给保障、设备折旧优惠、减轻利息负担等优惠政策措施,助力重化学工业发展。此外,日本政府还指出了改善雇佣状况、消除低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必要性,以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还设计了雇佣人数提升1.7倍、人均消费支出提升2.3倍的目标。为此,日本政府实施了扩充最低工资制度、健全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完善年金制度、提高工资水平、推进消费结构高级化等措施^[36]。日本的劳动分配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49.7%提升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60%^[37]。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居民的消费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消费水平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在高速增长时期,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被日本称为“三神器”,标志着日本消费水平的提质改善。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日本政府认为,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而言,需要通过出口创汇,提升国内外汇储备,以确保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产品的采购,从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在日本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也持续增加。日本的贸易顺差从1965年的1017.8亿日元增加到了1971年的14.8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大力推动技术引进,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由于日本当时的技术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需要从国外进口技术,实现生产技术的现代化。日本的技术进口金额从1960年的9400万美元提升到了1970年的43.3亿美元^[38]。

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本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水平,积极促进对外出口,以获得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国内的重化学工业化,并且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提升日本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水平。在国际循环的强有力支持下,日本国内产业不断升级转型,构建了一般机械、电子机械、汽车等支柱产业,并推动企业生产率提升的成果在劳资双方合理分配,提升了居民收入,增强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不断扩大日本国内的市场规模,从而在外循环与内循环之间形成了良性的正反馈。在1955年至1973年期间,消费、企业设备投资等对实际GDP的平均贡献率达到60.2%、15.7%,而贸易依存度维持在20%左右,呈现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状态^[39]。

(三) 单纯依赖外循环的发展模式使日本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大力实施对外经济政策,注重推动产业链海外布局,陷入对外循环这一“单循环”的依赖。而对国内结构性问题的处置不足,导致国内国际循环没有实现有效衔接,使日本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状态。1990年至2020年间,日本的实际GDP增速仅为0.8%,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4.6%^[34]。

村上研一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了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所面临的本质矛盾。村上研一认为,战后日本通过重点发展重化学工业,提升了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企业为了提升生产率,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生产方式,扩大非正式雇佣人员规模,抑制工资提升。这一方式仅导致了一部分出口企业受益,而日本国内内需则因此持续低迷^[40]。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修改《劳动派遣法》,导致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规模进一步增加,国内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利于日本国内循环的有效开展^[41]。由此可见,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日本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国内产业升级转换停滞,无法形成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在外循环方面,日本长期实施的对外经济战略,导致日本经济对外循环的依赖度与日俱增。日本的贸易依存度从1992年的14.9%迅速提升至2021年的30.9%。净出口对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1974—1984年间的18.5%进一步提升到1996—2020年间的49.2%^[34],对外经济关系对日本经济的驱动作

用愈发明显。一方面,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快速提升,从1990年的5228.7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1.52万亿美元,增长了2.9倍。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日本制造业产业链进一步向海外转移。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对亚洲、欧盟、北美等区域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从1995年的84.4亿美元、32.3亿美元、63.9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488.6亿美元、151.1亿美元、627.9亿美元。日本企业在亚洲、欧盟、北美等地设立的企业法人数量从2011年的1.21万家、0.26万家、0.28万家增加到2020年的1.73万家、0.29万家、0.32万家^[42]。

在内循环方面,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转型调整,但对推动日本产业升级转型的效果并不显著。为缓和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和美国开展“市场导向型多领域谈判”,达成《日美结构问题协议》,日本削弱了对重点产业的政策支持。例如,在1985年终止了对日本机械和电子产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特定机械信息产业临时措施法》。自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日本政府实施了以“产业活力再生法”“产业竞争力强化法”为代表的产业再生政策,试图加快企业经营业务调整,促进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推动资源要素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但事与愿违,日本产业升级的步伐逐渐停滞。20世纪60—70年代,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之下,日本的电子产业一度凭借较高的质量以及低廉的价格迅速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成为日本重要的支柱产业。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竞争对手的实力增强,日本的电子产业迅速衰落。1995年日本的电子产业顺差为8万亿日元,而到了2013年则转变为3.7万亿日元逆差^[4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日本新的主导产业,信息服务业曾被寄予厚望,但其发展始终缓慢。其全要素生产率在2015至2018年间为-1.2%,市场规模为20.1万亿日元,远小于汽车产业57.5万亿日元的规模^[44]。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虽然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实施积极的对外经济战略,大量制造业企业纷纷赴海外设厂生产,但由于缺乏产业升级支撑,员工工资长期得不到提升,导致日本国内大循环不畅、国内需求萎缩,而且产业海外转移后所释放出来的资本、劳动力资源无法被消化吸收,生产资源也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这使得日本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缓慢,经济发展陷入对外循环的依赖,日本经济始终无法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进入增长轨道。

三、日本“双循环”经济实践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启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从对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演进的历史过程分析可以看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形态,通过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不断实现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

(一) 立足国内大循环,着力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构建国内大市场。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注重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实施包括行政机构、社会保障、经济结构、金融系统、教育体系、财政结构等在内的改革,从供给的角度出发消除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因素,促进日本经济活力的提升。在经济循环的流通环节,日本政府积极推动流通业的现代化和系统化,推动中小零售企业提升经营水平与经营效率。20世纪90年代,日本修改《大型零售店法》,放宽对大型店铺设置的限制性条款,减少对中小零售企业的保护,提高流通业整体竞争力,提升商品销售效率。在消费领域,日本强化产品标准化建设,提升商品供给质量,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推动日本居民消费提质升级^[45]。1973年日本制定《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明确消费产品的安全标准。2001年日本制定《标准化战略》,提升对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的参与度,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需要发掘内需潜力,实现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体系,消除生产资源流动障碍。二要充分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构建高效物流平台,提升商品流通效率。三要积极推动消费品标准制定,提升消费品质量,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二）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

20世纪60年代,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立足持续扩大的国内循环,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发展,使得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经济政策为重化学工业部门中的大企业所利用,使得日本政府积极推动符合大企业利益的对外经贸战略。日本的大企业虽然借此实现了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经营利润,但这也使得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大企业为了削减人力资本支出,推动日本政府修改了《劳动派遣法》,使得日本企业中的非正式雇佣人数急剧扩大,从而导致日本企业员工收入增长缓慢,无法形成扩张性消费预期,国内循环受阻。由于经济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无法形成,生产资源的使用效率持续降低,日本经济增长缓慢。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循环与外循环关系的发展演变,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参考。首先,要认识到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是一个相互统一的整体,要统筹好国内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配置水平。其次,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避免陷入“单循环”误区,既不能形成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也不能仅仅依靠外循环支撑经济增长,要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提高对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争取开放发展的战略主动。

（三）加快科技自主创新步伐，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为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在国际大循环中的优势,需要持续增强科技水平,构建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技术引进的空间不断缩小,迫切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持续增长。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技术立国”口号,加大基础研究开发力度,设置大型科技创新研究项目。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强化政府对科技的引领作用,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建立《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促进形成产、官、学一体的国家创新体系。日本政府用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财政预算金额不断增长,从1992年的5400亿日元增加到2021年的5.3万亿日元^[46]。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方面,日本曾实施针对中小企业的《机械供应振兴临时措施法》和《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重点培育从事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引进、提升生产效率的设备投资、企业间的协作等非研发创新活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需要持续强化科学技术创新,不断向着产业链供应链上游攀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一是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强化国家对科学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明确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不断提升量子、太空、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水平。二是制定全面的产业链供应链战略,全面梳理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促进官、产、学、研合作,实现进口替代,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三是有效引导资金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流动,为产业升级转型提供充足资金支持,防止资金流入虚拟部门,防范资金“脱实向虚”。

（四）优化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内生动力。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日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初次分配时,注重提升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早在1955年,日本就设置了“生产率本部”,实施“生产率运动”,推动劳资双方开展协商合作,在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同时增加员工雇佣人数,充分发掘劳动者潜能,推动生产率提升的成果在劳资双方合理分配。在二次收入分配时,日本通过财政税收制度设计,构建公平合理的二次分配制度,致力于提升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战后日本建立的税收制度,以直接税为主体,对高收入者实行较高的税款征收,从而较好地发挥了财政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此外,日本还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于1961年开始实施国民皆保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从而增加了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为此,需要吸收日本在优化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一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二是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完善直接税体系,提高财政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 夯实多层次社会保障, 满足多样化服务需求,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0.
- [2] 財務省. 貿易統計 [EB/OL]. (2022-08-17) [2022-08-25]. <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info/>.
- [3] 张乃丽, 李明洋, 封璐瑶. 日本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J]. 日本问题研究, 2022, 36(3): 27-38.
- [4] 谢世清, 杨帆. 日本“双循环”经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J]. 国际贸易, 2022(3): 37-43.
- [5] 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 第一卷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279-282.
- [6] 都留重人. 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138-142.
- [7] 通商産業省. 通商白書 [M]. 東京: 大蔵省印刷局, 1991: 120.
- [8]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世界貿易マトリクス [EB/OL]. (2022-06-01) [2022-08-25]. 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statistics/data/matrix1985.pdf.
- [9] 鷺尾友春. 日美博奕战 [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21: 174.
- [10] 小島清. 日本の海外直接投資 [M]. 東京: 文眞堂, 1985: 54.
- [11]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日本の国地域別対外直接投資 [EB/OL]. (2022-06-01) [2022-08-25]. <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html>.
- [12] 外務省. 我が国ODAの軌跡と成果 [EB/OL]. (2022-04-01) [2022-08-25].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224038.pdf>.
- [13] 浦田秀次郎. 日本のFTA戦略 [M]. 東京: 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2002: 2.
- [14] 金ゼンマ. 日本の通商政策転換の政治経済学 [M]. 東京: 有信堂高文社, 2016: 232.
- [15] 三菱UFJリサーチ&コンサルティング. RCEPの概要と日本への影響 [EB/OL]. (2022-06-15) [2022-08-25]. https://www.murc.jp/wp-content/uploads/2020/12/report_201223.pdf.
- [16] 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 財政金融統計月報 [EB/OL]. (2022-06-06) [2022-08-25]. https://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hyou/g833/833.html.
- [17] 陈建. 21世纪日本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53.
- [18] 両角良彦. 産業政策の理論 [M]. 東京: 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1966: 15-18.
- [19] 篠原三代平. 長期不況の謎をさぐる [M]. 東京: 勁草書房, 1999: 28.
- [20] 宮澤健一. 産業連関分析入門 [M]. 東京: 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2005: 14.
- [21] 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 战后日本经济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6.
- [22] 経済産業省. 工業統計調査 [EB/OL]. (2021-08-25) [2022-08-25]. <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yo/kougyo/archives/index.html>.
- [23] 国際協力銀行. 我が国製造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調査 [EB/OL]. (2021-12-24) [2022-08-25]. <https://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press-2021/1224-015678.html>.
- [24] 経済産業省. 工業立地動向調査 [EB/OL]. (2022-05-27) [2022-08-25]. <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ii/ritti/index.html>.
- [25] 小峰隆夫. 日本経済の記録 [M]. 東京: 佐伯印刷, 2011: 551.
- [26] 文部科学省. 民間企業の研究活動に関する調査報告 [EB/OL]. (2010-04-01) [2022-08-25]. 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293659/www.mext.go.jp/b_menu/toukei/chousa06/minkan/1267231.htm.
- [27] 国際協調のための経済構造調整研究会. 前川レポート [EB/OL]. (2004-06-17) [2022-08-25]. <https://www.komazawa-u.ac.jp/kobamasa/lecture/japaneco/maekawarep.htm>.
- [28] 张季风. 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23.
- [29] 张季风. 日本经济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3.
- [30]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 [EB/OL]. (2017-04-10) [2022-08-25]. https://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pp_zenkoku2017.asp.
- [31] 田正, 武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日本经验与启示 [J]. 日本学刊, 2019(3): 111-135.
- [32] 総務省. 家計調査報告 [EB/OL]. (2022-08-05) [2022-08-25]. <https://www.stat.go.jp/data/kakei/sokuhou/tsuki/index.html>.

- [33] 徐禾. 政治经济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90.
- [34] 内閣府. 国民経済計算 [EB/OL]. (2022-08-15) [2022-08-25]. <https://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
- [35] 莽景石. 下村治の高速增长理论与哈罗德——多马模型 [J]. 日本研究, 1991(3): 1-7.
- [36] 経済審議会. 国民所得倍增計画 [M]. 東京: 大蔵省印刷局, 1960: 60.
- [37] 須合智広, 西崎健司. わが国における労働分配率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J]. 金融研究, 2002(6): 125-169.
- [38] 経済企画庁. 経済白書 [M]. 東京: 大蔵省印刷局, 1979: 86.
- [39] 内閣府. 長期経済統計 [EB/OL]. (2018-06-01) [2022-08-25]. https://www5.cao.go.jp/j-j/wp/wp-je18/h11_data01.html.
- [40] 村上研一. 停滞衰退する日本の産業・経済: 日本の産業構造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か [J]. 経済, 2021(11): 17-28.
- [41] 村上研一. 金融緩和と2010年代日本の産業・経済 [J]. 企業研究, 2020(8): 21-42.
- [42] 経済産業省. 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査 [EB/OL]. (2022-07-01) [2022-08-25]. <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yo/kaigaizi/index.html>.
- [43] 西村吉雄. 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 [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4.
- [44] 経済産業研究所. JIPデータベース2021 [EB/OL]. (2021-03-22) [2022-08-25]. <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21/index.html>.
- [45] 包振山. 日本“购物难民”的产生、影响及启示 [J]. 中国流通经济, 2021, 35(2): 61-70.
- [46] 財政総合政策研究所. 財政金融統計月報 [EB/OL]. (2022-05-01) [2022-09-10]. https://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index.ht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of Japan's Economy: Evolution Proces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Tian Zh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How to effectively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of the economy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ques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In terms of external circulation, Japan actively promotes export trade and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completing industrialization, Japan focused on implementing the overseas layou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 In terms of internal circulation, Japan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order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ubble economy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issue. Wh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promote each other, the Japanese economy has achieved rapid growth.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ubble economy, the Japanese economy fell in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single cycle”, under whic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could not be effectively connected, and the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fell into a long-term slump.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economic dual circulation system has significant reference to China.

Key words: Japan; internal circulation; external circul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domestic demand

责任编辑: 刘有祥 李祖杰